◀阿来镜头下的云中之树

阿来VS李敬泽

我们不可能靠大数据给读者精准投放作品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10月14日，著名作家阿来和评论家李敬泽作客杭州单向空间，以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出版二十年为起点，围绕历史与虚构、作者与读者、何为文学经典等角度展开对谈。

“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文学作品。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读者，而是手中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这样说。

“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还能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则这样认为。

阿来（左）和李敬泽对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田野调查中孕育的小说 “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

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1976年初中毕业，当时最想成为一名地质学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地质学校，可惜理想没实现，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我在中学教历史课，讲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好像不知道地方史，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处在一种悬空的状态。”阿来说，这种悬空感让他开始做田野调查，“我认为需要建立起历史观，于是开始做地方史的研究。”

阿来花了四年时间，走遍了四川省阿坝地区，研究这里曾有的十八家藏族土司的来龙去脉。

“我敢说，当地的土司后人没有一个能比我更清楚他们的历史。”田野调查全部结束后，十八家土司的故事了然于心，1994年5月的一天，阿来坐在书桌前，《尘埃落定》的开头自然流淌出来——“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小说写了八个月后定稿，当年阿来35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便放在今天，人们也不难理解处女作长篇要出版会遇到的重重困难。

出版社编辑跟他说“再改改”，狂妄的阿来回复：“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需要改”。直到1998年，拖了四年的《尘埃落定》终于出版问世；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文坛站稳脚跟。

《尘埃落定》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的崩溃，建构出一幅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细节的藏人生活图景。

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 “作为整体的读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尘埃落定》写完后，阿来离开了故乡马尔康来到成都，很快从《科幻世界》杂志的编辑一路升到了总编辑、社长。

“我做了十年杂志总编辑，发现编辑很喜欢说‘推荐这篇小说的理由是，读者会如何如何……’我在编辑部立下规矩——不许替读者说。谁提读者，我认为是在偷懒。一部作品要征服所有人，就像要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和这部作品发生交集，而你不知道这部分人是谁。作为个体的读者，我们可以交流，作为整体的‘读者’概念，你无法把握。”

《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推出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前后两部作品各自横跨五十年，被阿来视作他家乡的百年史。阿来说，如果《尘埃落定》可以用比较新颖来形容，那么《机村史诗》采用了更写实、更凝重的写法。这当然会有风险，读者不认怎么办？

这种担忧其实没有必要，阿来说：“不存在雅俗共赏、人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尘埃落定》畅销二十年，发行量过百万，一放在全国人口基数里看，它仍然是小众的。如果文学可以分门别类、划分等级，我们可以依靠大数据给读者精准投放，但实际上这做不到。既然做不到，编辑和作者要考虑的就不应该是读者，而是手中的作品……”

而在李敬泽看来，任何伟大的经典作品，都是由作者和一代代读者共同完成的，每一代读者都会对文本作出新的阐释。李敬泽用《尘埃落定》打比方，“我相信今天10个读者里有8个对土司制度没兴趣，但为什么大家还愿意读？因为你在里头能看到我们的迷茫，也能找到心向往之的美好。从这个意义说，文学作品本身一直在生长。”

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李敬泽坦言更看重《机村史诗》。他直言，这部作品之所以不如《尘埃落定》反响大，是字数太多了——超过一百万字。“但我更看重《机村史诗》，是因为它以巨大的体量，撑开了一个极丰盛和繁复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现代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从地方性根基走向普遍的人性 “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

“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复一年。祭师阿巴感到身上云中村的味道越来越淡，他的力气在消散，内心越发不安。于是，两匹马，一个老祭师，踏上了回乡的山路。他穿过山林和田野、石碉和磨坊，来到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往。”2019年，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出版。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阿来的作品有着牢固的地方性根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关切着这片土地，但他又从牢固的地方性根基走到了普遍的人性。《云中记》给我很强烈的感受，他写的是汶川地震期间一个村庄，但其间所表达的对生命、土地的情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李敬泽说，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在于它能将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巨大差异的人们连接起来。

同在2019年，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问世，李敬泽担任丛书评审主任，丛书收录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当被问及选择书目的标准时，李敬泽回应说，“我就怕被问这个问题，这个书目并不是我们手里有一条标准和规定，恰恰相反，我们要看看哪些书活到了今天、还历久常新，哪些作品还能和今天的我们发生关系和对话。”

此外，李敬泽还坦言：“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文学排名，因为缺乏客观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评来评去，今年给了路易丝·格吕克，她肯定不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至少在我看来。我自己可以给作家排序，但这个排名对别人毫无意义。”

《云中记》：悲情应当节制

201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十年后的一天，阿来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情绪，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脑海中浮现，但这和他当时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毫无关系。最终他放下了手头的小说，开始创作《云中记》，而这个突然浮现的形象，就是小说中的祭师。

地震发生后，阿来心里也有很多话想说，当时也有很多作家提笔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察。但他警惕这样的写作，“在重大的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而这东西是什么，当时的阿来并没有想清楚。直到十年后，人物和故事才从脑中冒了出来。

“我的写作常常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感兴趣，它就会一直在我心里。我不会着急去表达，而是先克制住冲动，因为冲动很可能是短暂的。长篇的写作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必须经过充分的内心准备，否则无法一口气写到底。”

对于汶川大地震，阿来关心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灾区和灾民的情况，他更关心重建中的灾区。“自然灾难发生后，人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如何重建生活和社会……在我看来，这比一时的受灾情况更重要，这也是我在小说中想表达的。”阿来说，他试图通过《云中记》来处理和提供对死亡、对自然这两方面的新书写。

尽管题材是沉重的，但阿来写得十分克制。他说：“我一直特别反对煽情。中国传统文学、戏曲，特喜欢或者说特愿意放大悲情。当我们从苦难中提升不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灵魂有洗礼的东西，似乎也就只好放大那些悲情。但当我找到别的途径去写这种情感时，反而觉得悲情应当节制。”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这样的教育真好

10岁男孩被疑划车坚决否认，父亲认赔3500元，民警追查3天真相反转，看到这条网络热议的新闻，真感觉治愈。

事件中被疑划奥迪男孩的父亲发声说：“这件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真的要感谢认真负责的邹警官，虽然事情本身不是很大，但是邹警官一直觉得不能冤枉孩子，积极沟通，反复研判，连续几天查阅监控录像，尽心尽力去寻找真相，还了孩子一个清白，守护了孩子心灵中的阳光。”

优秀的家长，负责的警官，让孩子坚信正义的力量，教科书般的教育过程。诚信教育，法律教育，家庭教育，家长教育。

培根说，一次错误的审判堪比对水源的污染，坏了人心。这条新闻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父亲和一个负责的警察，给人们带来的规则信仰，像一道光芒照亮人心。不仅避免了对一个孩子的伤害，让孩子有了规则和诚信自信，也是对社会公义的滋养。

如果孩子被冤枉了，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很多孩子变坏，就是从第一次被冤枉无人相信，从而选择相信拳头，迷信反规则、潜规则、破坏规则的。

从叙述过程看，这个父亲太聪明了，循循善诱，以身示范，尊重孩子，不想当然，用事实说话。这件事对家长们的教育，比对孩子重要多了。

【含英咀华】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香港有四大名山

住在深圳河北岸河滨，向南望就是香港的山水田园。远处的高山云中缥缈，隐约可辨飞鹅山和大帽山，却不是我熟悉的“四大名山”。各地游客也许知道谁称“四大天王”，谁是“四大家族”，而香港还有“四大名山”。

真的有，而且是正牌“官宣”的。1996年9月香港邮政局推出“群山系列”邮票，四枚美丽邮票分别为马鞍、凤凰、狮子、八仙加冕，是为香港四大名山。24年前我凝视着四大名山的邮票，啊，壮丽：马鞍山有彩虹相伴，凤凰山迎着旭日，狮子山雄视蓝天白云，八仙岭顶着晚霞新月。诸山于我不但可观而且可亲。我在沙田吐露港滨的大学宿舍居住多年，从露台外望，一峰如宝鞍，排岭若众仙，朝晖夕阴面对着面。它们是我亲切的巨型雕塑艺术。“山水有清音”，山水也有知音，沙田文友对马鞍山和八仙岭礼赞不绝。一位说马鞍“雄奇”、八仙“峻秀”；一位熏熏然恋上八仙，认为四季各有美姿：“春秀夏媚，秋肃冬寒”。

凤凰山在离岛。某年金秋，有沙田四友结伴勇攀登；在峰顶的彩照，后来成为诗文集和传记的常见插图。至于雄伟险峻的狮子山，我缺乏新亚书院校歌“艰险我奋进”的“高攀”胆量，只能仰望，只能放歌。《狮子山下》有“同舟共济”、“追求理想”的励志豪情，它俨然是香港的“市歌”了。

香港的疫情起伏不定，我睽违这个“故乡”快十个月了。从前沙田众文友北望神州，现在我独自南望香岛，怀念其山水，以及是山水知音的那些文友。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德厚者流光？

古人常常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如《谷梁传·僖公十五年》有一段话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为祖。”所提到的是从天子到士设祖宗牌位的规定：天子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士设二庙供奉两代祖先，之后还有“德厚者影响深远，德薄者影响不远”的判断。但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情况正好相反。

前一段我在一所大学参加博士开题，碰到一位从前的朋友，得知我还在做有关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翻译和研究时，他对我说：“这个四平八稳的老学究究竟有什么研究头？他一生甚至连一点绯闻都没有。还是做一点有意思的研究和翻译吧。”我明白这位老兄的意思，他希望我研究曾经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有婚外恋情，曾希望投身于纳粹政治运动之中去，近年来又因为《黑皮书》而一直被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我有时在想，大部分人所关注的一定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是他“有意思”的一生。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德薄者流光！”

1933年，海德格尔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德国新纪元的开端，于是他开始了投身于纳粹的政治冒险活动。

朱子（1130-1200）从反面认为：“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稀不伤手也。”而管子（前723-前645）却从正面讲道：“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尽管朱子和管子早海德格尔几百年乃至两千多年，但作为德国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依然没有从中国智慧中汲取适当的养分！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感化教育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幼儿园遭宵小潜入，创办人钟建强事后翻看闭路电视，发现小偷并没有窃取任何贵重物品如电脑或现金，只是从冰箱里拿了蔬菜和肉类，就匆匆离开，可见他是饿瘪了才铤而走险的。

动了恻隐之心的钟建强，当下就准备了好些瓜果蔬菜，放在大门口，方便小偷来取。一些家长知悉后，也自动自发地捎来食物，为贫苦人士雪中送炭。

法律不外人情。

钟建强洞悉了小偷犯案的动机后，以仁厚之心包容了他的错误，且还不动声色地给予他帮助，充分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襟怀和气度；而这，也可被视为一种绵里藏针的感化教育。

朋友阿梅经营书店，对于偷书者，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成年人偷书，她一律严办，绝不手软。她说：“泅泳于书海的成人，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犯错而受法律制裁，是咎由自取。”如果偷书的是青少年，她便放他一马。她说：“偷书的少年，往往是阮囊羞涩的爱书者，我又怎能报警来毁他的大好前程！”有个少年，一连偷了好几回。他再来时，她拉他到一个角落，悄声对他说道：“你前几回拿了书，忘记还钱呢！”少年脸色大变，她紧接着说：“以后，你要买书，我给你打五折。”少年一段长时间没有来，再来时，已经有了买书的钱。他告诉阿梅，他课余去快餐店打工。如今，他大学毕业，为人师表，一直都是书店的常客。

睿智的阿梅，以“感化教育”保护了一个社会栋梁。

●随手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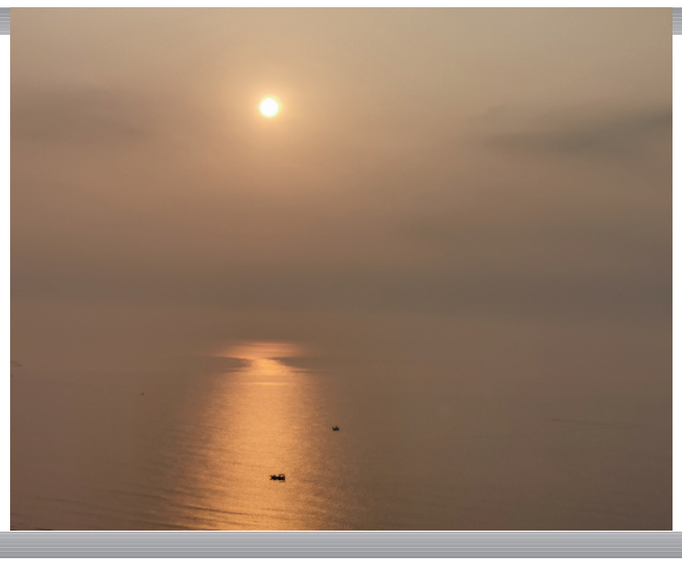
沧海夕照 □文/图 黄巍俊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是许多人渴望已久的“放松”时刻。

天气预报说放假期间将会有雨，并有一定程度的降温。10月4日的阳江海陵岛，游客也真没有前几日那么多。可在抵达的下午，还是可以在酒店的阳台上，看到“动人”的夕阳和海面上的光影，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拍摄。

在手机十倍光学变焦的加持下，一个完全普通的傻瓜模式，就轻松地将这绝美瞬间记录下来。接着就是一番例牌的神操作后，朋友圈上获点赞无数……

随着科技的发展，记录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单反相机独家专利。



“随手拍”手机摄影征稿

本栏目向广大读者征集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来稿请附上100-200字的简短文字，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稿费从优。

【横眉冷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威尔逊的危险看法

加谬说，自杀是哲学。威尔逊一听就笑了，回应说，自杀是视丘下部和大脑边缘系统失去平衡的结果。加谬的意思是，自杀作为如此决绝的一种人生选择，本身就具有严肃的人文色彩。

威尔逊摇头，在他看来，类群进化落实到个体，而自身作为物种的一个延伸，与自然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匹配关系，个别系统发育不完全，所以才会出现失控，但这不是普遍的现象。至于“人文”，安慰而已。

加谬甚至极端地说，只有自杀才是问题。威尔逊否定了这一结论，因为统计没有给出相同的结果。人作为物种之一，自杀只占全体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几而已。

他们根本就无法对话。

威尔逊是研究蚁类和蜂类的专家，长期的观察与分类使他确信，作为高度社会化的昆虫类别，进化已经在它们身上打下了利它主义的道德基础，并体现为一种天然的分工，为生存创造了最大的空间。

威尔逊甚至热爱白蚁，因为他为其中大公无私的社会化举措感动不已。

我怀疑，在威尔逊眼中，人类社会就是蚁蜂社会的升级版。只是，进化所给予人的高度智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个别系统失控所导致的局部失序的现象，正在日益构成一个比哲学还要严重的公共问题。

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激烈地反对威尔逊的危险看法，但似乎又无法彻底驳倒他的观察与推理。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回时代的新女性

193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上海西区豪华的海格路公寓楼前，金发浓妆女子开车，往路边扔下一名醉汉绝尘而去，这一幕恰好被“小富春”的老板娘明玉所目睹。从这一夜起，明玉的生活卷入鬼魂、噩梦、争吵、流血、失踪、命案和瘟疫，各色人等纠缠在明玉周遭……这是上海女作家唐颖的新长篇《个人主义的孤岛》有点悬疑的开端。

唐颖是一位女性主义色彩浓郁而又有着世界主义视角的作家，虽然成长于上海，却一直想远走高飞。她的作品，时间和空间上的敞开与开阔，情感上对上海有着依存与背叛的复杂情感。唐颖的小说大多描述着女性的情感故事，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各种复杂文化对峙与摇摆中，欲望与道德、东方与西方、个人与时代，那些女性内心总是有着飞蛾扑火的勇气，虽然可能结局总是充满伤痛，却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情隐秘地照亮她的灵魂。

她最新的这部长篇，仍旧是一部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只不过这一次，主人公不是与唐颖同时代的女子，而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唐颖说：“写历史女性，也在映照今天的女性。沦陷或自救，无论哪个年代，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

唐颖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最初来自学者张真关于早期上海电影的论著《银幕艳史》，那部已经遗失了部分片段的默片电影《银幕艳史》，讲述女明星被富家公子引诱而放弃演艺事业，又被抛弃，最终从破碎家庭挣扎出来重新回到片场，走上独立之路的故事，其实那也是电影女主角扮演者自己的真实故事。

小说中，明玉生活在一种无根的漂泊感里，同时，也道出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精神特质。但谜团深处，时代洪流裹挟之下，个人主义者能否独善其身？